

研究論文

# 重回共同體：社交媒體時代三線單位 集體記憶的個人書寫 ——以STJ微信公眾號為例

辛文娟、張娜

## 摘要

社交媒體帶來了傳播權力結構的變化，通過賦權實現了記憶的民主化並使集體記憶進入公民化書寫的時代，分散的個體記憶因得以集中呈現而變得更有力量。本研究以中國西北部某三線單位為個案，考察社交媒體時代三線建設者的記憶方式和邏輯結構。研究發現，社交媒介通過時空重構使普通三線建設者在此交匯，為其賦予構建歷史的權力和機會。他們通過書寫、互動和情感共振將個人記憶不斷上升為集體記憶，在虛擬世界中重構想像的共同體，進而強化身份認同、重建心靈秩序。研究最後總結了從個體記憶到集體記憶的上升邏輯，並

辛文娟，四川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網路與新媒體系副教授、四川外國語大學三線建設研究所副所長。研究興趣：媒介與社會發展、性別與媒介傳播。電郵：eanow@qq.com

張娜，四川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興趣：新媒體傳播、健康傳播。電郵：839494627@qq.com

論文投稿日期：2021年5月22日。論文接受日期：2021年8月31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指出重構集體記憶是三線建設者的本體性需求，是他們進行身份想像的一個歸宿。

關鍵詞：社交媒體、集體記憶、個體記憶、共同體、三線建設

---

Research Article

## **Returning to the Community: Writing Individual Memories into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Third-Front Units in the Era of Social Media—Taking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STJ” as an Example**

Wenjuan XIN, Na ZHANG

---

### **Abstract**

Social media has sparked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has led to the democratization of memory by empowering ordinary people and bring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into the era of civic writing. These decentralized individual memories have become more powerful as they can now be centrally presente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ase of a third-front unit in Northwest China to investigate memory mode and logical structure of third-front builders in the era of social media. The present study finds that social media allows ordinary third-front builders to meet each other in virtual spaces through space-time reconstruction, giving them the power and opportunity to build history. Through writing, interaction,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these builders constantly turn personal memories into collective memory, reconstruct

---

Wenjuan XIN (Associate Professor). Network and New Media Departm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Deputy Director of Third-Front Constru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ender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Na ZHANG (Master Stud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1 (2022)

the imaginary community in the virtual world, strengthen identity, and rebuild spiritual order. Finally, the study summarizes the logic arising from individual memories toward collective memory while pointing out that reconstructing collective memory is an ontological demand of third-front builders and a destination for their identity imagination.

**Keywords:** social media, collective memory, individual memory, community, the third-front construction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Xin, W., & Zhang, N. (2022). Returning to the community: Writing individual memories into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third-front units in the era of social media—Taking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STJ” as an example.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1, 59–91.

## 致謝

本研究為以下科研專案的階段性成果：國家社科基金2019年重大專案「當代中國公眾歷史記錄理論與實踐研究」(19ZDA194)、四川外國語大學2021年校級科研後期資助專案「重回共同體：社交媒體時代三線單位集體記憶的個人書寫」(sisu202155)、重慶市教育委員會2022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專案「社交媒體環境下三線單位集體記憶的個人書寫」(22SKGH241)。作者衷心感謝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法學與社會學院的張勇教授以及《傳播與社會學刊》的諸位編輯和匿名評審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和建議。

## 引言

### 研究背景

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 包含著人類社會的歷史，也昭示著未來的發展，對於人類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權力取向的記憶研究 (簡稱為「權力觀」) 是當下中國記憶研究的主流範式，它強調記憶現象背後的權力因素的作用 (劉亞秋，2021a：170)。這種主流範式導致集體記憶長期被詬病為強權的產物，甚至被判定有很強的精英意識。目前許多學者指出這種範式忽視了個體記憶 (individual memory) 的主體性，輕視了記憶的想像性和個體性。社會記憶的建構需要以傳播媒介為基礎。社交媒體帶來了傳播權力結構的變化，改變了傳統媒體時代由精英主導的記憶書寫格局，通過對無權的個體或者群體賦權，實現了記憶的民主化並使集體記憶進入公民化書寫的時代，分散的個體記憶得以集中呈現而變得更有力量 (劉亞秋，2020)。

如今在社交媒體中有一股強勁的追求集體記憶和群體認同的力量——曾經的三線建設者。三線建設是中國在1964年至1980年基於戰備需要而對全國工業佈局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戰略性調整 (徐有威、陳熙，2015)，在中西部及偏遠山區建立了1,945家軍工國防單位 (陳東林，2003：359)。三線建設影響了上千萬中國人，並在這段歷史進程中形成了大量的三線單位命運共同體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改革開放後隨著中國逐步走向市場經濟，許多三線單位調整改造，淡出或消失於歷史舞台。曾經作為時代主人翁的「三線建設者」經歷了國家政治意志下的政策性身份生產、單位制框架下的身份實踐與體制改革下的結構性身份消解 (謝景慧、吳曉萍，2020)，然後被動地成為邊緣的離散群體 (discrete group) 並長期沉默。如今飛速發展的社交媒體突破了時空邊界，將離散的三線建設者連綴一體，為他們主動書寫關於三線單位的集體記憶提供了空間。

基於此，本研究以中國西北N省的一個三線單位「STJ礦務局」為例，該礦務局在破產重組多年之後，其原有職工及家屬建立微信公眾號並主動書寫個體對單位的記憶。基於自下而上看歷史的邏輯，本研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究將探討社交媒體環境下三線建設者如何創造性地運用社交媒體來進行集體記憶的個人書寫。

本研究可能的理論貢獻包括三點。第一，對個體記憶的探尋，會在一定程度上跳脫或補充集體記憶研究的權力觀視角，讓我們看到結構性因素(structural factors)(制度、政策等)、非結構性因素(non-structural factors)(個體獨特的生命歷程、表達動機等)以及社交媒體賦權(social media empowerment)如何共同作用於集體記憶的建構。第二，深入走進三線建設者這個重要但長期沉默隱秘的群體，展現主流之外的邊緣群體的記憶方式及邏輯，有利於以中國的社會實踐去深化記憶研究的領域。第三，深化對社交媒體環境下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關係認知，個人記憶上升為集體記憶的表現方式及內在邏輯。

## 文獻回顧及問題提出

### I. 社交媒體環境下的集體記憶與群體認同

在大眾傳媒時期，權力時常借助媒體掌控話語權，進行有選擇的記憶書寫，使記憶往往成為「精英的記憶」(周海燕、吳滿有，2012)。如今社交媒體技術深刻影響了記憶的塑造進程，使集體記憶突破了精英壟斷、進入大眾書寫時代(Birkner & Donk, 2020)，鏡像出個體主體性意識的覺醒和對記憶話語權的爭奪(陳旭光、宋奇勳，2019)，「民眾記憶」的覺醒已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

目前有關社交媒體時代的集體記憶，主要包括兩類主題。第一類是關於集體記憶的建構研究。學者們以危機事件(Zhang, Nekmat, & Chen, 2020)、西班牙共和黨流亡(Barbecho & Toscano, 2016)、南斯拉夫搖滾音樂(Pogačar, 2015)、法西斯主義2.0(Fuchs, 2017)、史達林主義者(Khlevnyuk, 2019)、強姦事件(Harp & Loke, 2017)、粉絲哀悼明星(Harju, 2015)、南京大屠殺(黃順銘、李紅濤，2015)、克拉瑪依大火(閔岩、張皖疆，2020)、《南方週末》的新年獻詞(章震、涂勝彬、陳席元、宋磊晨、能青青、范焯，2016)、中國恢復高考40週年(王潤，2018)、傳統村落(高子棋、滕曉瑜、任婧婷、吳卓，2020)和文化遺產(Burkey, 2019)等為切入點，探討線民如何在社交媒體環境下構建集體

記憶，研究內容主要包括記憶建構的主體、內容、途徑、影響因素以及民間記憶與官方記憶的爭奪等。第二類是關於社交媒體環境下邊緣群體的集體記憶與身份認同的建構研究。集體記憶「是身份認同的力量之源」(徐擁軍，2017：104)，互聯網潛藏著再造社會團結與共同體生活的可能性(胡百精，2014)。相關研究主要以少數民族群體的記憶實踐為關注點。如苗族人利用快手等影像方式書寫並傳播集體記憶(郭建斌、程悅，2020)，彝族家族微信群的日常資訊互動與社群意識構建(張媛、文霄，2018)，白族村落微信群中的資訊互動及脫域共同體(community of delocalization)構建(楊星星、唐優悠、孫信茹，2020)等。研究均發現離散程度日益加劇的少數民族成員大量借助社交媒體實現共同在場，社交媒體成了他們構建親密民族關係的場域，緩解了個體對於民族身份的認同危機。

## II. 三線建設的集體記憶研究

目前有關三線建設的研究頗為豐富，但研究以自上而下看歷史為主(周曉虹，2020b)。近年出現了一些關注三線建設者個體的微觀研究，關注他們參與三線建設的獨特感受和集體記憶。關於三線建設集體記憶的研究往往與口述史研究關聯在一起，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底層社會關懷。相關成果如徐有威和陳東林(2015)主編的《小三線建設研究論叢》系列、張勇(2019)主編的《多維視野中的三線建設親歷者》、陳劍虹(2015)主編的《貴州黔南三線建設者口述史》、周曉虹(2020a)以洛陽和貴州幾個三線建設單位為例展開的口述史研究、常江瀟和周曉虹(2021)以洛陽礦山機器廠為例展開的口述史研究等。根據這些口述史可梳理出新中國工業化進程中集體記憶的建構邏輯，揭示命運共同體視野下工業化敘事的歷史意義。另一些研究則採取間接方式獲取資料，分別從紀念空間、圖書、影視藝術作品中探討有關三線建設的集體記憶。有學者探討三線建設者在參觀攀枝花三線建設博物館時個人記憶與官方記憶之間的互動關係(劉靜伊，2019)。有學者以重慶816核工程遺址(丁小珊，2021；羅晶，2020)、霧山三線記憶小鎮(李順、王冬，2020)等工業遺址為例，探討這些記憶空間在三線建設者的集體記憶和身份認同等方面的作用。有學者梳理了有關三線建設的小說，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探討不同代際三線建設者的記憶差異(王小平, 2016)。有學者以電影《青紅》(楊俊蕾, 2006)、電視劇《大麗家的往事》(畢珍鑫, 2012)、話劇《記憶密碼》(周娟, 2020)等為例, 探討三線建設者的精神困苦、創業歷史、個體情感等問題。

受以上研究的啟發, 筆者特別關注了主流群體外的邊緣群體「三線建設者」的記憶實踐問題, 聚焦於「社交媒體如何賦權三線建設者進行集體記憶的個人書寫」, 具體涵蓋三個問題:

問題1: 社交媒體如何賦權三線建設者中的個體來書寫個體記憶?

問題2: 三線建設者書寫的個體記憶上升為集體記憶的邏輯結構如何?

問題3: 集體記憶在重構三線建設者群體認同中的意義如何?

### III. 研究方法: 案例選擇、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選擇的案例是位於中國西北N省的STJ礦務局, 簡稱STJ。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煤炭工業部將其列為第三個五年計劃(即1966-1970年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期間西北大三線建設的重點礦區(辛文娟, 2020: 1)。當時在國家行政命令的號召和調撥下, 全國各地數萬名建設者相繼來此參加煤礦建設工作, 他們在艱苦封閉的礦區中朝夕相處, 形成了緊密的命運共同體。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 隨著市場經濟深化和國企改革加速, STJ破產重組。從2000年至2008年, 居民逐漸分流且遷出礦區。他們去向各異, 有的遷到STJ所在的地級市城區, 而更多則遷至原籍所在地或其他省份, 出現了明顯的離散現象。2017年4月24日, 現居上海的原STJ子弟FQ自發創辦了「STJ微信公眾號」來書寫自己的三線記憶, 隨後迅速吸引了更多STJ人參與到書寫中, FQ於2018年年底又成立了作者微信群以輔助公眾號的運作。截至2020年11月24日, 該公眾號的粉絲逾20,000人, 共有82位STJ作者在該公眾號發表原創文章533篇, 單篇文章的平均點擊量逾5,000次、文末平均互動留言逾30條。

筆者於2017年8月1日經人推薦發現了STJ微信公眾號, 隨後對其一直密切關注。2017年10月通過在評論區留言, 與該微信公眾號的創辦者FQ和總編輯FW建立了聯繫, 並互加了微信好友。從2020年11月



24日開始，筆者用了兩個月收集整理這533篇文章並對其進行文本分析。第一次整理時，筆者按照時間順序，將每一篇文章及其後的評論內容複製粘貼到一個Word文檔。同時建立一個Excel匯總文檔，記錄每一篇文章的標題、作者、發表時間、記憶主題、被評論次數、被轉載次數等。第二次整理時，筆者將這533篇文章按照記憶主題進行歸類，發現了有關STJ的「物質、行為和精神」這三大研究主題。第三次整理時，筆者按照文章的作者進行歸類，發現了12位重點作者（含公眾號的創辦者和總編輯）和10位在公眾號評論區最活躍的粉絲。第四次整理時，筆者特別記錄了這533篇文章的內容之間、文章內容與評論區的留言之間的互動關係。

2020年12月1日，筆者經該FQ同意，加入了由她創辦的作者微信群（82位作者中有67位加入此群，其他15位由於各種原因未加此群）。從此後至2021年6月1日，筆者使用網路民族誌（internet ethnography）對該微信群進行觀察，盡量不參與傳播、不發表觀點，減少對微信群既有交流模式的干擾。筆者重點觀察記錄成員們的資訊交流情況，包括他們使用的文字、圖片、視頻、表情包等多種形式的聊天文本及日常互動模式，同時特別關注他們的情感表達內容，定期採用「同步助手App」將聊天記錄匯出為Excel文檔以便後期分析。

半結構訪談於上述觀察期內同步展開。在觀察過程中，筆者通過單獨加作者微信的方式，與12位重點作者和10位重點粉絲取得了聯繫。在徵求了他們同意之後，對這22個人分別進行了電話訪談，每次訪談時長為30分鐘至三小時不等。在所有訪談中，筆者採取電話錄音為主、筆錄為輔的方式同時記錄訪談內容，隨後使用「訊飛聽見App」將錄音轉為文字稿。筆者的問題主要包括：參與記憶書寫的緣起，書寫的內容、方式及遇到的問題，在STJ生活的經歷，發現該公眾號的時間、情境，與其他作者和公眾號粉絲互動的情況，該微信公眾號對自己生活的意義等。

筆者在方法的實踐過程中，盡量將文本分析、網路民族誌觀察和訪談所搜集到的資料進行相互驗證和校正。同時，為了保護被訪者的隱私，筆者對文中涉及的地方名稱、單位名稱和線民名稱一律進行了匿名處理，均用其英文字母縮寫來代替。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 書寫與集體記憶的喚醒

書寫是一個不斷喚醒記憶的過程，也是一個符號化敘事的過程。STJ 微信公眾號上關於集體記憶的個人書寫，讓我們可以細緻入微地走進 STJ 人的生命歷程和內心世界。83 位作者發表的 533 篇記憶文本反映了大量類似的、微小的且極具個人生命體驗感的生活事實。這些文本看似零散紛亂，但是它們拼接起來，卻構成了一個關於 STJ 的比較完整的符號化表意系統，具體涵蓋關於 STJ 的物質文化符號、行為文化符號和精神文化符號。

### 物質文化符號的書寫

物質文化符號指向具體可感知的物質形態。在記憶的建構過程中，物質是記憶的索引，經由時間沉澱成為記憶的符號。許多文章反覆書寫關於 STJ 的頗具代表性的物質文化符號，主要包括自然環境符號、特殊物產符號和地方文化景觀符號，借此掀開 STJ 社會生活的無數個角落，刻寫個體關於 STJ 的記憶。

從自然景觀符號的書寫來看，書寫者們特別關注 STJ 地方歷史上形成的特色自然景觀。STJ 地處沙漠與戈壁交界地帶，其自然環境最大的特點就是風大山多。作為一個地緣群體，STJ 人普遍對當地的風與山有特殊情感，許多文章都凸顯了這兩個景觀符號。在封閉的礦區生活中，STJ 人大多以似曾相似的行為應對這種自然環境特徵，因此多位作者描寫自己曾在廟山和大西山春遊、在山上撿頭髮菜或捉蠍子、在矸石山上撿煤渣、在葫蘆峪爬山玩水等行為，粉絲常在這類文章的留言區寫下諸如「這跟我當年幹的事兒簡直是一模一樣啊」、「這一看就是自己人寫的」之類的評論。一個地方的靈魂深藏於它的自然景觀之中。這些極具特色的自然景觀符號，是凝結 STJ 人地方情感和認同的基礎，是他們的群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容易引發 STJ 人共鳴並喚起其集體記憶。

從特殊物產符號的書寫來看，書寫者們特別關注 STJ 特有的兩種物產：沙棗和涼皮。礦區普遍種植的沙棗樹(具有抗旱、抗風沙等特點)

的果實沙棗和快捷實惠且能滿足各地移民口味的「STJ風味涼皮」都曾在物質匱乏的年代長期佔據STJ人的味蕾。多位作者在書寫中將這兩種物產作為思鄉之情賴以寄託的符號。如「長大後在很多地方吃過涼皮，但是再也吃不出童年的味道。也許有些味道和記憶只能留在STJ了」。<sup>1</sup>食物在喚起STJ人舌尖上的記憶的同時，也喚起他們對過去生活場景的記憶和對三線單位的集體情感。

從地方文化景觀符號來看，那些在STJ礦區內部可見度和公眾特徵很高的景觀（如經常播放電影和舉行各種文藝活動的電影院、最繁華的綜合商業中心X市場等）是作者們反覆書寫的重點。在命運共同體急劇變遷的過程中，電影院和X市場折射了三線建設時期獨特的人地關係，是STJ人凝結共同體情感的生活基礎。如今它們化身為作者們承載對共同體想像的記憶符號，亦是構建關於STJ集體記憶的重要符號。

### 行為文化符號的書寫

行為文化符號指人們在生活方式、習俗、人際交往活動等其他行為方式中體現出的人文因素。在一種文化中成長，人們需要學會用自己的身體和語言反覆實踐，形成獨特的身體習慣和行為文化。「行為文化作為一種符號，不僅是身體的記憶，更是群體成員共同記憶的認知內容，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持久力」（康納頓，2000：117）。作者們反覆書寫的STJ人共用的行為文化符號主要是各種礦區常見的儀式，尤其是歡慶儀式和安全教育儀式。

在封閉單調的偏遠礦區，STJ各級工會特別重視開展各種歡慶儀式以活躍礦區文化氛圍，廣大職工家屬的參與積極度很高。許多作者曾分別描寫逢年過節時工會組織的鬧社火、放煙花、遊園、放露天電影、文體聯賽等活動。另外，由於安全是煤礦單位的第一生命線，因此STJ各職能部門常年舉行各種安全教育儀式。多篇文章分別描繪了當年有關安全生產的班前會、知識競賽、家屬座談會等。在習慣性記憶中，過去是積澱在身體中的（康納頓，2000：90）。無論是歡騰的節日慶祝儀式還是嚴肅的安全生產教育儀式，都已在日復一日的操演中內化為身體與心靈的記憶，成為STJ人對共同體生活的條件反射性記憶和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沉澱在其中的情感。因此這類文章的點讚和評論量往往很大，常有粉絲跟帖書寫自己所親歷的儀式過程及個人感受。

### 精神文化符號的書寫

精神文化符號的書寫指向深層次的記憶書寫，既包括物質載體，又包括以思想觀念、心理狀態等形式存在於人們大腦之中的文化。由於不同代際的STJ人親歷了不同的時代進程和單位發展階段，因此他們對STJ精神文化符號的記憶呈現出明顯的代際差異。

鋪開歲月的畫軸，第一代STJ人(多為1930–1940年代生人)艱苦奮鬥的創業史是最富有衝擊力的記憶圖景，「苦難與忠誠」是他們強調的精神文化主音符。他們反覆書寫的苦難主要包括三個方面：自然環境惡劣、井下採掘技術條件落後且危險係數高、高污染高強度作業導致工人落下職業病，這些構成了他們難以忘懷的生存體驗和集體記憶。但是他們在書寫艱苦的勞作記憶時，又總是提到對三線事業的忠誠和不計回報的奉獻精神，充滿帶有英雄主義的悲情色彩，體現出自我對平凡和苦難的超越以及「命運共同體成員在面對內部困難和外部威脅時承擔起的共和國的苦難」(周曉虹，2020a)。這本質上是時代精神和情緒的投射。當時社會主義倫理價值觀的核心部分是理想主義、集體主義和大無畏的獻身精神，這種樸素的價值觀念深入創業者的心中，導致他們當時的思想和行為總體接近，這為他們如今在社交媒體中書寫記憶提供了共同的敘事框架，為個體記憶上升到集體記憶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代STJ人(多為1950–1960年代生人)關於STJ的精神文化符號書寫呈現出明顯的割裂狀態。首先，許多第二代STJ人大量描寫了自己在工作生涯前期見證的礦區高速發展情況，「輝煌」是書寫的關鍵字。如他們多次提到煤礦工作區建設基本成熟、生活區的基礎設施大大改善、單位多次獲得各級表彰、職工收入和生活滿意度提高等。其次，許多第二代STJ人又描述了自己在工作生涯中後期所經歷的單位衰敗情景和命運共同體消解後個體情感無所依託之痛，「落寞」則成了書寫的關鍵字。如「咱煤炭工人不是端的鐵飯碗嗎？怎麼這飯碗說沒就沒了？

單位沒了，整個人就像一粒塵埃」。<sup>2</sup> 普通STJ人切身承受的國企改革之痛曾長期被淹沒在時代大潮中。在社交媒體賦權下，個體書寫終於令這些記憶的微光得以浮現。而恰恰是個體對這種「痛」的書寫，能夠在最深層次和最廣範圍內調動STJ人的集體記憶，因為單位的破產改制從根本上撬動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基礎和安身立命的方式，迫使他們離開了單位共同體並開始了新的生活。

第三代STJ人(多為1970年代後生人)在單位破產改制前大多處於求學或工作初期，因此他們關於STJ的記憶總體圍繞著家庭與學校這兩個生活場景展開，且書寫大多以抒情的筆觸呈現出樸素且明亮的底色，「溫暖」是他們對單位精神文化符號的提煉。他們的書寫最常提到的主題就是家庭，重點描述家庭成員之間的親密關係及父母年輕時的勞作情景。他們筆下的父母不僅是家庭的庇護者，更是三線精神的具體實踐者，如有作者認為他的父母「如其他許多人的父母一樣，吃苦耐勞、艱苦樸素、精明能幹、踏實純樸，是STJ精神(五湖四海、自強不息)的化身」。<sup>3</sup> 此文引發了眾多粉絲跟帖回憶自己的父母為煤礦建設事業流血流汗的歷史。另外，他們的書寫也常提到學校生活場景。封閉的礦區空間中，師生、生生之間的日常互動特別密切，以至於他們如今的書寫中充滿了關於校園中交流細節和溫暖情愫的回憶。

雖然三代人對STJ精神文化符號的書寫存在明顯的代際差異，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他們的不同記憶圖景中發現某種一致的「框架」：第一，把自己置身於群體中，強調自己與群體成員之間的相似經歷及持續的互動關係，強烈認同單位及其精神內核；第二，把自己置身於三線單位的組織和國家的發展之中，家國情懷鮮明。這種記憶框架的形成微觀上受個體生命歷程的影響，中觀上受三線單位獨特的集體組織模式的影響，宏觀上則根本受制於當年集體意志高於一切的時代精神，呈現出社會、單位和個體交織的建構機理。

綜上可知，STJ人將個體的生命體驗作為三線單位歷史最直接的投射，借助特殊的表意符號不斷書寫關於STJ的記憶。在此過程中，個體記憶如溪流一般不斷匯向集體記憶的汪洋，達成了群體的情感認同。這使該公眾號帶有關於三線建設的深刻歷史烙印和獨特的精神氣質，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也使其成為STJ人關於三線單位集體記憶的系統化和符號化呈現。首先，符號是個體表達思想和情感的媒介與手段，STJ人利用物質符號、行為符號和精神符號，構建出立體的網狀的符號群，展現了他們共同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風俗習慣，還原了一個真實而多元的過往時空，引起STJ人集體的緬懷與回想，使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相互纏繞。其次，符號可以通過各種物質形式對STJ人的身份進行標識，勾勒出集體的「自我形象」，並體現出STJ人對於單位共同體強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最後，符號的意義在於它承載了價值觀念和道德規範，使STJ人把自己置身於群體中，也置身於三線單位和國家的發展之中，共同維繫著「社會對於個人的至高無上的優先性和社會的團結」(肖瑛、李曉華，2004)。

## 互動與集體記憶的強化

集體記憶需要在個體互動的過程中被構建、維持與修正，並需要在個體互動中得以實現和交換，其書寫過程是個體將自我視為群體組成部分互動的過程(張媛、文霄，2018)。STJ人充分利用社交媒體交互性強的特點，採用文本互動、社群聯結、儀式操演等交互和分享行為來強化集體記憶。

### 文本互動

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曾指出，回憶是在與他人及他們的回憶的語言交流中構建的(哈布瓦赫，2002：76)。因為語言的符號化建構，記憶被文本化。受不同主體、不同時代和不同世界的影響，這些記憶文本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但它們都是「真實的過去」的「痕跡」，是對彼此的反思和證明，並共同組成了記憶共建的根本機制(趙靜蓉，2013)。在STJ公眾號中，多元記憶主體以不同的視角書寫記憶，許多文章之間出現了文本內容的互證和關聯現象。許多作者曾多次書寫過同一人(多為礦區知名人物，如礦長、文藝骨幹等)、物(多為礦區標誌性事物，如大西山、八號泉、水庫、子弟學校等)或事(多為礦區公共

事件，如礦難、盜竊案、文體活動等)。同時，粉絲們通過公眾號開通的點讚、評論或打賞功能來表達對某個記憶文本的看法或者態度，並與作者或其他粉絲展開互動。最終記憶文本之間的互文建構起關於STJ的集體記憶。這種互動過程不斷充實豐富了個體記憶，並使個體記憶不斷演化為集體記憶。

以公眾號中有人反覆書寫的STJ下轄的二礦於1981年7月13日發生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為例。此事最早由作者YC在〈礦難：STJ二礦瓦斯爆炸〉一文中提及，她原本只描述了自家人當時的焦急狀態。但由於這場礦難是許多STJ人的心中之痛，因此引發了許多人的回應。大量粉絲在評論區內發佈「流淚」、「雙手合十」或「點蠟燭」等表情包以表達自己的哀傷。作者XH寫道「我三叔就是那次事故犧牲的，礦上有人來家裡報喪，一家人哭得天昏地暗，當時我還小，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作者QF寫道自己當天在剛下班後就在井口親眼見證了這場事故的發生。有粉絲回憶稱「當時我讀三年級。出事後我跑到停屍的防空洞看情況，當時哭聲一片」。有粉絲回憶起自己的同齡人就在那次事故中遇難。作者XZ在寫作〈三礦童年回憶：STJ的防空洞〉一文時，披露了自己通過查閱地方志和《STJ礦工報》等方式了解到的關於那次礦難的權威資訊。即便集體記憶是從人類整體中得到力量和延續，但仍然是個體成員在記憶，每個個體記憶都是集體記憶的一個視角(哈布瓦赫，2002：45)。在不同文本的互證關聯過程中，個體關於礦難的碎片化記憶不斷被拼湊起來，文本之間形成了對話關係並呈現出更具個人化與差異化視角的內容，構建出群體關於這場礦難的集體記憶。每個個體的記憶就像一根絲線，參與書寫的人越多，這張「網」的面積就越大，絲線之間也越細密，記憶就越會超越個體局限性並以最大公約數的方式呈現出集體記憶的樣貌並捕捉到更多受眾。

## 社群聯結

從個體層面看，社交媒體能有效激發個人潛能，拓展個體言說和行動的可能性，使聯結跨越時空，便於個體拓展人際關係(喻國明、馬慧，2016)。從群體層面看，賦權作為一個互動的社會過程，其中必然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依仗人際互動。個體與他者通過持續交流互動實現情感認同與信念支撐，進而發展出緊密的關係網絡，並協同實現他們作為分散個體所無法達成的記憶目標(孫黎，2019)。在STJ人的記憶書寫中，基於不同關係的社群聯結(包括記憶空間的自我建立與管理、社群之間互動協商)有效實現了集體記憶的生產。

STJ微信公眾號的創辦者FQ出生於1960年代，是STJ職工子弟。STJ各礦於2000年紛紛開始破產改制後，其家人全部遷往外地。她於2010年11月建立新浪博客來書寫自己對STJ的回憶文章。她的寫作初衷是「雖然市政府、煤業集團都曾出書來記錄STJ的發展史，但是那些內容都太宏觀空洞，幾乎不涉及個人生活和心靈。我想寫我心中鮮活的記憶。出本書難，但是開個博客多簡單」。她陸續發佈的近百篇博文逐漸吸引了其他STJ人。在微信強勢滲透進更多中國線民的生活之後，她於2017年7月14日創辦了STJ微信公眾號，將博文一律轉發於此。這些文章被其他STJ人在朋友圈和各微信群轉發之後，吸引了更多粉絲。其中許多粉絲在受到她的啟發後也開始寫文並給公眾號投稿，使稿件來源更多元化。2018年FQ建立了作者微信群並成立了編委會。文采斐然的FQ是編委會主任，責任心強的FW是總編輯和財務總管，其他三位骨幹作者分別負責外聯、聯繫採訪物件、排版等職責。編委會制定了公眾號的宗旨、發文規約、稿件策劃規章等。該作者群除了內部有序互動外，還積極與STJ人組建的其他各種網路社群(如同鄉群、同事群、同學群、家庭群等)保持密切互動。如骨幹作者XZ稱「在寫作前，我常會在中學同學微信群中請大家幫助我回憶相關細節，有同學會為我提供照片等來豐富我的文章內容」。這說明社群互動賦予記憶以「流動性」，使記憶能夠在群體之間流動並不斷被擴充與更新。同時，作者群中的成員會積極將該群中一些重要的資訊發佈轉發到自己所在的網路社群中，擴大STJ微信公眾號的影響力，吸引更多潛在的寫手。他們也會將在其他網路社群中看到的重要資訊轉發至作者群內，引發成員討論，或將其作為「記憶的觸發器」以作為其他作者的寫作線索。社群互動聯結了更多離散的STJ人，為書寫提供了更多記憶資源，豐富了記憶內容。



至此，作者微信群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非正式組織。它有社會群體的一般組織形態與結構要素，如相對穩定的成員、比較頻繁的成員互動、清晰的群體目標和層級管理等。成員們通過各種關係網絡和自身文化實踐以致力於達成「書寫我們心中鮮活的STJ」這一群體目標。分散的個體以集體協作的方式為長期失聲的群體爭回記憶的主動構建權，帶來記憶方式的創新與變革。

### 儀式操演

保羅·康納頓 (Paul Connerton) 將「社會儀式」和「身體實踐」視為集體記憶建構和維繫的重要環節 (康納頓, 2000: 45)，如今社交媒體的介入革新了資訊傳播方式，改變了身體「在場」的機制，使社會記憶的維繫以一種網路操演的姿態進入公眾視野 (孫洋洋, 2015)。

儀式體現在微信公眾號中STJ人的新年獻詞中。自2018年起，每年元旦，總編輯FW都會在公眾號上發表新年獻詞，製造STJ人週期性的「集體歡騰」。獻詞每次都會吸引粉絲上萬次點擊量和大量評論及轉發，粉絲無意中扮演了記憶的接收者、生產者與傳播者等多重身份，從而強化了STJ人的集體記憶。獻詞儀式不只是傳遞資訊的過程，更是STJ人過去共通的意義符號被創造、理解和共用的過程，對於STJ人重返單位生活中的歷史場景具有很強的情感號召力。

儀式也體現在STJ人經常「相約重回STJ」這類聚會活動上。STJ人往往從樸素的情感出發，自發組織重回STJ的活動以重溫單位共同體的感覺。聚會是操演性的語言，也是一種強有力的記憶手段。STJ人的聚會比較「格式化」，內容和形式比較重複。在大多情況下，聚會者都會重遊STJ的典型工業遺產建築，如選煤樓、辦公樓、居民樓等，並在此合影留念。工業遺產建築作為承載著集體記憶和工業精神的場所成為意義生產和記憶書寫的重要資源 (何麗沙、焦楊明慧, 2018)。通過對這些共同熟悉的工業遺產的反覆指認與表述，聚會者將心中難以言表的複雜感受表達出來，詮釋出能夠相互理解的往昔，產生親切感、認同感以及歸屬感，使個人世界與他人世界相互融合，並強化集體記憶。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同時，聚會往往再生產共同體話語，因為它可以啟發回憶或引發討論。一些聚會者會把相關照片或視頻發到個人朋友圈，再轉發到STJ微信公眾號或者其他網路社群，引發更多圍觀者。總編輯FW稱「每次一旦有人發了重回STJ聚會的文章，就很容易引發上萬次閱讀量。好多人還會在評論區稱自己邊看邊流淚，很懷念過去」。可見儀式具有很強的滲透性，能夠把價值和意義傳遞給那些有共通語境的人，激起他們的共同回憶。這種線上與線下同步的活動模糊了虛擬空間和現實空間的邊界，使集體記憶建構的意義空間被加倍放大，使聚會者與圍觀者都產生了重回共同體的感覺。

通過以上兩種集體記憶的反覆展演，個體記憶融匯於集體記憶中，並成為集體記憶中不可或缺的內容。

綜上，社交媒體為STJ人的記憶互動提供了全新的場所。文本互動、社群聯結、儀式操演等線上與線下結合的互動行為，使STJ人的個體記憶始終處於流動和交互過程中，使記憶主體實現了對話，並使個體記憶系統中的內容和結構被整合起來並最終形成了關於STJ的交換記憶系統，大大拓展了個體的記憶容量。可以說依託社交媒體發生的互動是集體記憶生成的一個重要條件。

## 共振與集體記憶的昇華

記憶是一種認知活動，也是一種有關情感體驗的行為。情感使記憶更加有溫度，讓記憶得以成為有關過去的回溯與追憶。在STJ長期共同生活的經歷使STJ人的記憶書寫經常體現出類似的情感體驗，他們在彼此傾訴的過程中，在「重建身份認同」和「追憶共同體精神」這兩方面產生了明顯的情感共振。

### 重建身份認同

社會轉型期的中國，流動性和去地域性不斷增強，各群體不斷分裂和重組，依託群體歸屬的身份認同也就面臨著更多的風險和矛盾(陳

寧，2014)。身份認同是一種辨識的過程，其目的在於確立自己的身份，找到自己的歸屬。身份認同建立在記憶的基礎上，記憶所提供的經驗、事件以及情感構成了身份認同的基礎(艾娟、汪新建，2011)。三線建設時期，STJ人肩負崇高的國家職責，在單位體系中形成了集中化程度極高的行動和思維模式，結成了具有強烈排他性的我群意識。但是国企改革浪潮中STJ破產改制、居民外遷，離散衝擊甚至瓦解了許多STJ人的本體性安全，給他們帶來了「失根」體驗，進而產生了群體性的身份焦慮。這對人的自我認同構成了威脅，造成了個人存在的意義危機。

為了克服個體迷失所產生的種種流弊，維繫個人的本體安全，STJ人頻繁地在公眾號中追問和確認「我是誰」，體現了鮮明的自我認同困惑和尋根意識。如有作者稱「遷徙，似乎是STJ人的宿命。幾十年前，五湖四海的人遷徙到來成為STJ人；幾十年後，STJ人又遷徙到五湖四海」。<sup>4</sup>FQ稱她創辦該公眾號的初衷就是「連接更多的STJ人，共敘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由此可見，對於STJ人而言，單位共同體的消失是一個有待解開的長期哽在心頭的傷痕。在社交媒體的賦權下，解除了技術束縛的個體找到了公眾號這種自我表達的話語平台、聚合起來抱團療傷。

STJ公眾號的圖示LOGO是由酷愛刻印圖章的總編輯FW專門為其刻印的篆體字STJ，這本身就蘊含著STJ人對故鄉的眷戀之情。FW稱其寓意是「STJ是每個遊子心底不變的烙印」，有不少作者和粉絲因喜愛這個LOGO而特意將其設置為自己微信朋友圈頂部的背景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作者的網名本身就嵌入了故鄉的符號。如，終年不斷的大風是STJ鮮明的自然環境符號，公眾號的創辦者FQ和總編輯FW給自己起網名時就不約而同用了「風」字，將其作為思鄉和身份認同的「標識碼」。集體記憶背後既不是集體靈魂也不是客觀精神，而是帶有不同標誌和符號的社會通過共同的符號，個人分享共同的記憶和身份認同(阿斯曼，2015：145)。在社交媒體賦權下，STJ人積極尋求身份認同的「符號化表達」，通過自創的鮮活符號體系來展現他們關於故鄉的獨特記憶，帶來他們對於自身文化形態的認同和意義所指，形成了群體內部獨特的傳播符碼，也密切了群體成員之間的交流溝通與情感認同。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綜上，主體身份的碎片化、認同的缺失使STJ人努力在社交媒體中彌補身份。社交媒體賦權大大增強了他們的自主性，便於他們在新的媒介場域中找尋並重新定位自我身份。人都會渴望將親密關係同一個可以反覆體認的空間結合起來以確定自己的身份認同(楊慧瓊，2012：36)，依附於某個地方，並深切地與之相連，乃是人類的一項基本需求(雷爾夫，2021：60)。社交媒介恰好為STJ人提供了一處超越了時空限制的虛擬空間，它為在互聯網上不停找尋認同的STJ人提供了棲息地，創造了他們書寫記憶、追求自我原有身份的意義空間。他們在此虛擬空間中重組地方關係，實現身份想像的重新地方化，進而抵擋他們在現實空間中痛徹心扉的失根體驗。集體記憶的主要目的不在於記憶本身，而是在於通過記憶來追溯過去，以凝練和聚合社會或群體的存在、價值及理念(Weedon & Jordan, 2012)。同時，這個過程伴隨著持續性的社會生活空間轉換後的新環境與記憶經驗的碰撞與重整，在修正與調試中不斷為自我身份賦予新的意義(謝景慧、吳曉萍，2020)。從這個意義上說，集體記憶的書寫既是對三線單位歷史的保存，也是對三線建設者身份迷失的補救與抗爭，具有一定的自我救贖的含義，這是有組織地重構自己的單位身份。這讓我們看到三線建設決策及與其相伴的單位制度今天仍以一種非正式的例行化習慣扎根於三線建設者的內心深處。

### 追憶共同體精神

隨著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許多三線單位開始衰敗，單位共同體走向消解，「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在這個過程中，數萬名STJ人從傳統有序的「命運共同體」中離散到全國各地，同時經歷了空間遷徙(從STJ礦區離散到全國各地)和時間遷徙(從計劃經濟時代陡然走進市場經濟時代)，進入到非傳統的秩序中。脫離了單位組織依附關係的STJ人開始處於游離和鬆散狀態，自由度增加的同時，不確定性也隨之增多。他們普遍遭遇了現代性體驗：如工具理性和市場邏輯導致的道德、審美和信仰衰微，缺少價值理想的感召和凝聚，淪為孤獨游弋的原子，對自我生存價值和意義感到迷茫。

滕尼斯認為共同體中情感和道德的力量非常強大，而且與之相關的事物往往是「善」(good)的(成伯清，2011)。脫離了單位共同體的STJ人在社交媒體中書寫單位共同體中曾經蘊含的各種與「善」相關的價值觀，以此來對抗自己的精神危機。他們的文章中常提及的「善」包括：集體之善，具體指STJ作為三線單位當年的優秀品質，如包容團結、自強不息、制度嚴格、紀律嚴明等；人性之善，具體指各地工業移民在艱苦高危的三線單位所歷練出的各種品性，包括：互幫互助、忠誠度高、組織性強、吃苦耐勞、堅毅、樂觀等。如有作者寫道「在STJ這個近乎封閉的山溝，人與人之間的善意與真情，在今天的混凝土單元盒子裡，是再也見不到了」。<sup>5</sup>一位年事已高的作者在群裡曾經說：「我努力寫下這些文章，就是想把創業者當年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的精神記錄下來，讓後人牢牢記住咱STJ的精神：五湖四海、自強不息。」許多這種類似的情感內容看似沒有直接的相關性，但是其中暗含的是對單位共同體中蘊含的倫理、審美和信仰的追憶。在此情境之中，書寫者敘述的不是與他人無關的個人感受，而是共同體經歷中潛藏的群體共通的情感。通過集體懷念共同體中的各種「善」，書寫者不斷療癒個人的心理危機，離散的個體不斷超越自我，形成了精神上聚合的總體。

最終，STJ微信公眾號成為了一個與STJ人自身生活情境高度融合的網路空間，STJ人通過書寫、互動和情感共振，結成了虛擬共同體，增強了彼此之間的共情，實現了情感的延續和寄託。在三線單位破產重組後，個體能夠不斷從中汲取過去生活中的精神營養，提升人存於世的安全感。STJ人建立的歸屬感不僅僅是身份的同歸屬，更是基於記憶文本形成的價值與意義歸屬，也是基於社交媒體賦權所帶來新使用方式的歸屬。這種群體身份的認同重塑了被科技削弱的傳統社群關係(孫黎，2019)。可以說，在STJ人的書寫中，不僅包括生存層面的感受，還包括精神層面的感受，具體性和感觀性始終是它的特徵。在宏大的歷史進程中，個體記憶雖然顯得微小，但是它的作用並不微小，不容忽視，因為它令我們領悟到人類最基本的感情(劉亞秋，2021b：224)。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 總結與討論

本研究是以STJ礦務局這個三線單位為例展開的社交媒體時代的三線單位集體記憶的個人書寫研究。研究發現在三線單位破產改制、居民外遷多年之後，離散的STJ人在適應著去單位化和去地方化的生活狀態時，又通過社交媒體重構了自己與三線單位之間的關係。社交媒體的技術賦權為市場經濟改革後長期沉默的三線建設者保留了發聲管道。他們自發創辦微信公眾號和微信群，基於過去在三線單位共同體中形成的地緣、業緣、文化和情感等元素，以個體身份建構對單位共同體的集體記憶，在書寫和互動中達成了情感共振，進而在精神層面重回單位共同體。研究發現社交媒體是體制的結構性規制與人們的創造性記憶實踐之間相碰撞的介面，三線建設者的記憶實踐有利於他們強化身份認同、重構心靈秩序。

### 個體記憶如何上升為集體記憶

社交媒體對普通三線人的賦權和記憶框架對記憶的制約共同促使STJ人的個人記憶不斷上升為集體記憶。

#### I. 社交媒體的賦權

社交媒體改變了集體記憶的書寫方式與形態，建設性地參與了人們對特定事件的記憶，並從技術上催生了STJ人的個體記憶不斷走向集體記憶的可能性。首先，社交媒體對集體記憶建構機制的改變，是從突破時空邊界開始的。從時間上來說，社交媒體將STJ變成了「可攜帶的故鄉」，模糊了其存在的時間界限，將STJ的過去與現在勾連起來，並使STJ人自由地在記憶與現實之間遊走。從空間上來說，社交媒體突破了地理空間的邊界，將離散的STJ人連綴一體，使不同代際、不同人生處境的記憶主體基於「STJ人」這個身份認同能匯聚在一起，促成了多元記憶話語的交匯，催生了集體記憶。其次，隨著社交媒體的技術賦權，個體記憶的書寫方式更多元化。STJ人的記憶內容包括原創與轉載；記憶載體包括文字、語音、圖片、視頻等；記憶的互動方式包括

點讚、評價、轉載、打賞、聊天等，甚至還包括線下互動與線上互動之間的轉化。多元的記憶書寫方式生動鮮活地呈現出三線單位的歷史並喚醒了STJ人的集體記憶。最後，社交媒體強大的互動性和開放性打破了個體書寫者之間的隔閡，使個體在生產、傳播與交互記憶的過程中自發進行協同合作。當個體傳播的記憶內容得到他人認同時，他人自發的傳播動力和點對點的傳播模式會迅速放大個體的記憶內容，在社交媒體中形成廣泛的討論和分享，使個體記憶在交織與復刻中上升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最終，集體記憶以社會框架內個體記憶的最大公約數呈現，同時面臨更多個人化的創造（丁慕涵，2021）。

## II. 記憶框架的制約

STJ的微信公眾號和微信群中大量的書寫和互動資訊共同構成了關於STJ這個三線單位的記憶之網，這張看似龐大複雜的網其實是在隱形的社會框架內部編織而成的。這個社會框架主要包括STJ發展過程中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獨特的社會風貌。從時代背景來說，STJ完整經歷了中國的三線建設從口號提出、全面推進、高速發展再到轉型的整個過程。從社會風貌來說，STJ的經濟形式單一、社會結構簡拙、各種凝聚人心的集體活動頻繁，再加上煤炭這種高危行業需要全體成員精誠合作，所以STJ人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和情感表達等方面高度趨同，這為他們書寫集體記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表面上看，STJ人對記憶的書寫方式是極富個人色彩的、內容是龐雜的，但是他們的書寫從根本上看是異質同構的，個體記憶的表達其實深受社會結構規範的制約，與歷史情境、集體權力運作、主流意識形態緊密相關，總是將自我放置於「國家、單位、群體」中進行思考，都是在記憶的社會框架中書寫對共同體生活和精神的回憶。其他STJ人在閱讀這些記憶內容時，書寫者的敘事邏輯和閱讀者的個人主體性之間可能會進行互動，而這個過程其實也是受集體記憶的社會框架的無形制約，只有在過去的生活環境和所屬群體中人們才能最大限度地回憶他們的過去。許多STJ人其實最初僅僅是該公眾號的普通粉絲，但是受記憶框架和個人主體性的驅動，他們往往會化身為公眾號的書寫者，進而在記憶框架中生產個體記憶。最終，個體記憶不斷走向集體記憶，個體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被喚醒的情感也不斷轉化為集體共通的情感，從而形成情感共振。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框架在根本上制約著集體記憶的生產。

### 構建集體記憶於三線建設者之意義

作為歷史發展中的個體，STJ人以強烈的內在生命意識和歷史責任感為驅動力，從自己的生命歷程和個人感悟出發來自主建構對三線單位的記憶，用個人的命運來見證社會發展的歷史。這是每一位書寫者為了加強與曾經所屬的共同體之間的特有意義關聯所作出的努力。

STJ微信公眾號是STJ人關於三線單位集體記憶的系統化和符號化呈現，它對如今的STJ人而言具有深層意義。它是三線建設者離散以後回憶故鄉的寄託之地和尋找意義之地，也是他們身份想像的一個歸宿。借此微信公眾號，STJ人在實體的家園消失後又擁有了「可攜帶」的虛擬家園，而擁有家園就是「棲居」(dwell)。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認為，棲居就是人類存在的本質，也是存在(Being)的基本性質(雷爾夫，2021: 63)，這是人類靈魂最重要、最基本的需求(Dunaway, 1985)。STJ人歸根結底是渴望重建單位共同體中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找回人存於世的根基。共同情感是共同體的核心，是社會秩序的建構性力量(成伯清，2011)，而人與世界的各種情感關係構成了人之所以「活著」的主要內容。這是STJ人重構虛擬的三線單位共同體的意義所在，這也令我們意識到，無論何時，共同體都是我們心靈的歸宿。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在研究三線建設者的集體記憶時，必須考慮到「情感」既是他們書寫記憶的根本動力，又是他們記憶的關鍵內容。記憶承載著三線建設者對逝去的單位共同體的情感，而社交媒介通過喚醒記憶來令他們在虛擬世界中重溫這份情感。因此，STJ人在社交媒體的記憶實踐證明建構集體記憶是他們的本體性需求，他們的書寫動力很大程度源自制度變遷與他們內心最基本的認同需求之間的巨大張力。研究令我們領悟到通過關注個體記憶中蘊含的豐富的情感特徵並在其中找尋線索，會讓記憶研究呈現出更多關於個體主動性的東西。這也回應了學者劉亞秋曾提倡的觀點：應特別關注那些非結構性



的力量對集體記憶研究的啟發作用，而不至於總陷入權力決定論的陷阱（劉亞秋，2021b：139）。

## 研究局限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存在諸多局限。首先，本研究以「STJ礦務局集體記憶的個人書寫問題」為研究物件，並沒有將其他三線單位的記憶書寫實踐納入研究視野。事實上目前許多三線單位都出現了個人主動構建有關單位記憶的案例。未來的研究可以將更多典型的案例納入進來，從更宏觀和全面的視角展開分析以得到更具規律性和普遍性的結論。其次，本研究的觀察物件以微信公眾號為主、微信群為輔，未涉及其他網路傳播形式。但是其實各地三線建設者已經開始綜合使用各種網路傳播方式（如博客、百度貼吧、抖音、B站、美篇等）展開集體記憶書寫。未來的研究可以探討不同類型的網路傳播環境中，集體記憶的呈現方式、傳播機制和效果有何不同。最後，筆者在「集體記憶的書寫與喚醒」部分，曾提到不同代際的STJ人在書寫記憶時在主題選擇和表達方式上存在不同，但是限於本研究的主題和篇幅，筆者並未展開討論。未來可以研究代際變數對集體記憶構建的影響，並探討三線建設者如何通過代際合作來實現集體記憶的傳承問題。

## 註釋

- 1 節選自STJ微信公眾號文章〈再憶STJ的涼皮〉，發表日期為2018年3月15日。
- 2 節選自STJ微信公眾號文章〈在STJ最後的那幾年〉，發表日期為2019年10月9日。
- 3 節選自STJ微信公眾號文章〈我的母親，X礦農場的拓荒者〉，發表日期為2018年6月22日。
- 4 節選自STJ微信公眾號文章〈新年獻詞，致STJ人！〉，發表日期為2018年12月29日。
- 5 節選自STJ微信公眾號文章〈故地重遊：STJ三礦大商店〉，發表日期為2018年2月22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丁小珊 (2021)。〈三線工業遺產文化記憶的再生路徑研究〉。《社會科學研究》，第3期，頁198–206。
- Ding Xiaoshan (2021). Sanxian gongye yichan wenhua jiyi de zaisheng lujing yanjiu. *Shehui kexue yanjiu*, 3, 198–206.
- 丁慕涵 (2021)。〈社交媒體時代的集體記憶建構〉。《中國廣播電視學刊》，第1期，頁49–53。
- Ding Muhan (2021). Shejiao meiti shidai de jiti jiyi jiangou. *Zhongguo guangbo dianshi xuekan*, 1, 49–53.
- 王小平 (2016)。〈歷史記憶的文學書寫——40年來三線建設題材小說創作與出版述評〉。《中華文化論壇》，第12期，頁90–95。
- Wang Xiaoping (2016). Lishi jiyi de wenxue shuxie—40 nian lai sanxian jianshe ticaixiaoshuo chuanguozuo yu chubanshuping. *Zhonghua wenhua luntan*, 12, 90–95.
- 王潤 (2018)。〈個人奮鬥與時代變革：恢復高考40週年的文化記憶與闡釋社群建構〉。《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1期，頁27–44。
- Wang Run (2018). Geren fendou yu shidai biange: Huifu gaokao 40 zhounian de wenhua jiyi yu chanshi shequn jiangou.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11, 27–44.
- 艾娟、汪新建 (2011)。〈集體記憶：研究群體認同的新路徑〉。《新疆社會科學》，第2期，頁121–126。
- Ai Juan, Wang Xinjian (2011). Jiti jiyi: Yanjiu qunti rentong de xin lujing. *Xinjiang shehui kexue*, 2, 121–126.
- 成伯清 (2011)。〈社會建設的情感維度——從社群主義的觀點〉。《南京社會科學》，第1期，頁70–76。
- Cheng Boqing (2011). Shehui jianshe de qinggan weidu—Cong shequn zhuyi de guandian. *Nanjing shehui kexue*, 1, 70–76.
- 肖瑛、李曉華 (2004)。〈涂爾幹的人類學研究及其社會學旨趣〉。《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2期，頁10–13。
- Xiao Ying, Li Xiaohua (2004). Tuergan de renleixue yanjiu jiqi shehuixue zhiq. *Xinan minzu daxue xuebao (renwen sheke ban)*, 2, 10–13.
- 何麗沙、焦楊明慧 (2018)。〈場所記憶與遺產空間重塑——以洪江瓷廠整體更新改造為例〉。《遺產與保護研究》，第7期，頁100–107。

- He Lisha, Jiao Yangminghui (2018). Changsuo jiyi yu yichan kongjian chongsu—  
Yi Hongjiangcichang zhengti gengxin gaizao weili. *Yichan yu baohu yanjiu*, 7,  
100–107.
- 辛文娟 (2020)。《居住空間分異與交流重構：基於對某國企煤礦居民生活區的  
考察》。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 Xin Wenjuan (2020). *Juzhu kongjian fenyi yu jiaoliu chonggou: Jiyi dui mou guoqi  
meikuang jumin shenghuoqu de kaocha*. Beijing: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chubanshe.
- 李順、王冬 (2020)。〈解釋與重構：建築遺存再利用研究——以大邑縣霧山三  
線記憶小鎮為例〉。《城市建築》，第4期，頁154–158。
- Li Shun, Wang Dong (2020). Jieshi yu chonggou: Jianzhu yicun zai liyong yanjiu—  
Yi Dayixian Wushan sanxian jiyi xiaozhen weili. *Chengshi jianzhu*, 4, 154–  
158.
- 周海燕、吳滿有 (2012)。〈從記憶到遺忘——《解放日報》首個「典型報導」的  
新聞生產與社會記憶建構〉。《江蘇社會科學》，第3期，頁236–240。
- Zhou Haiyan, Wu Manyou (2012). Cong jiyi dao yiwang—*Jiefang ribao* shouge  
“dianxing baodao” de xinwen shengchan yu shehui jiyi jiangou. *Jiangsu  
shehui kexue*, 3, 236–240.
- 周娟 (2020)。〈時代畫卷中描繪出的精神圖譜 談話劇《記憶密碼》的主題意蘊  
和人物形象〉。《中國戲劇》，第3期，頁42–43。
- Zhou Juan (2020). Shidai huajuan zhong miaohui chu de jingshen tupu, tan huaju  
*Jiyi mima* de zhuti yiyun he renwu xingxiang. *Zhongguo xiju*, 3, 42–43.
- 周曉虹 (2020a)。〈口述史、集體記憶與新中國的工業化敘事——以洛陽工業  
基地和貴州「三線建設」企業為例〉。《學習與探索》，第9期，頁17–25。
- Zhou Xiaohong (2020a). Koushushi, jiti jiyi yu xin Zhongguo de gongyehua  
xushi—Yi Luoyang gongye jidi he Guizhou “sanxian jianshe” qiye weili.  
*Xuexi yu tansuo*, 9, 17–25.
- 周曉虹 (2020b)。〈口述歷史與集體記憶的社會建構〉。《天津社會科學》，第4  
期，頁137–146。
- Zhou Xiaohong (2020b). Koushu lishi yu jiti jiyi de shehui jiangou. *Tianjin shehui  
kexue*, 4, 137–146.
- 保羅·康納頓 (2000)。《社會如何記憶》(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原書Connerton, P.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 Baoluo Kangnadun (2000). *Shehui ruhe jiyi* (Naribilige,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Connerton, P.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胡百精 (2014)。〈互聯網與集體記憶構建〉。《中國高校社會科學》，第3期，頁98-106。
- Hu Baijing (2014). *Hulianwang yu jiti jiyi goujian*. *Zhongguo gaoxiao shehui kexue*, 3, 98-106.
- 莫里斯·哈布瓦赫 (2002)。《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Halbwachs, M.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olisi Habuwahe (2002). *Lun jiti jiyi* (Bi Ran, Guo Jinhua,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Halbwachs, M.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陳東林 (2003)。《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大開發》。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
- Chen Donglin (2003). *Sanxian jianshe: Beizhan shiqi de xibu da kaifa*. Beijing: Zhongyang dangxiao chubanshe.
- 陳寧 (2014)。〈社會記憶：破解社會認同困境的理論視角與分析路徑〉。《理論月刊》，第7期，頁167-167。
- Chen Ning (2014). *Shehui jiyi: Pojie shehui rentong kunjing de lilun shijiao yu fenxi lujing*. *Lilun yuekan*, 7, 67-171.
- 陳劍虹 (2015)。《神秘代號背後的建設人生——貴州黔南三線人口述史》。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 Chen Jianhong (2015). *Shenmi daihao beihou de jianshe rensheng—Guizhou Qiannan sanxianren koushushi*. Guiyang: Guizhou renmin chubanshe.
- 陳旭光 (2018)。〈邏輯轉向與權力共生：從網路流行體看青年網民的集體記憶實踐〉。《新聞與傳播評論》，第7期，頁63-65。
- Chen Xuguang (2018). *Luoji zhuanxiang yu quanli gongsheng: Cong wanglu liuxingti kan qingnian wangmin de jiti jiyi shijian*. *Xinwen yu chuanbo pinglun*, 7, 63-65.
- 陳旭光、宋奇勳 (2019)。〈佛系話語的記憶建構與意義實踐〉。《中國青年社會科學》，第3期，頁71-85。
- Chen Xuguang, Song Qixun (2019). *Foxi huayu de jiyi jiangou yu yiyi shijian*. *Zhongguo qingnian shehui kexue*, 3, 71-85.
- 徐有威、陳東林 (2015)。《小三線建設研究論叢第一輯》。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

- Xu Youwei, Chen Donglin (2015). *Xiao sanxian jianshe yanjiu luncong di yi ji*. Shanghai: Shanghai daxue chubanshe.
- 徐有威、陳熙 (2015)。〈三線建設對中國工業經濟及城市化的影響〉。《當代中國史研究》，第4期，頁83-94。
- Xu Youwei, Chen Xi (2015). Sanxian jianshe dui Zhongguo gongye jingji ji chengshi hua de yingxiang. *Dangdai Zhongguoshi yanjiu*, 4, 83-94.
- 徐擁軍 (2017)。《檔案記憶觀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Xu Yongjun (2017). *Dangan jiyiguan de lilun yu shijian*.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 孫洋洋 (2015)。〈社交媒體在社會記憶建構中的介入機制探析〉。《檔案與建設》，第3期，頁4-7。
- Sun Yangyang (2015). Shejiao meiti zai shehui jiyi jiangou zhong de jieru jizhi tanxi. *Dangan yu jianshe*, 3, 4-7.
- 孫黎 (2019)。〈身份、組織、生產：網路青年亞文化群體新媒介賦權實踐的三重層面解讀〉。《中國青年研究》，第6期，頁87-93。
- Sun Li (2019). Shenfen, zuzhi, shengchan: Wanglu qingnian yawenhua qunti xinmeijie fuquan shijian de sanchong cengmian jiedu. *Zhongguo qingnian yanjiu*, 6, 87-93.
- 高子棋、滕曉瑜、任婧婷、吳卓 (2020)。〈社交媒體背景下傳統村落集體記憶的建構研究〉。《新媒體研究》，第6期，頁94-96。
- Gao Ziqi, Teng Xiaoyu, Ren Jingting, Wu Zhuo (2020). Shejiao meiti beijing xia chuantong cunluo jiti jiyi de jiangou yanjiu. *Xin meiti yanjiu*, 6, 94-96.
- 畢珍鑫 (2012)。〈工廠時代的情與魂——電視劇《大麗家的往事》藝術分析〉。《電影評介》，第7期，頁63-65。
- Bi Zhenxin (2012). Gongchang shidai de qing yu hun—Dianshiju *Dali jia de wangshi yishu fenxi*. *Dianying pingjie*, 7, 63-65.
- 郭建斌、程悅 (2020)。〈「故事布」與苗語影像：苗族的媒介記憶及全球傳播〉。《現代傳播》，第1期，頁33-38。
- Guo Jianbin, Cheng Yue (2020). “Gushibu” yu Miaoyu yingxiang: Miao zu de meijie jiyi ji quanqiu chuanbo. *Xiandai chuanbo*, 1, 33-38.
- 章震、涂勝彬、陳席元、宋磊晨、能青青、范焯 (2016)。〈(1997-2016) 理想的「外衣」：《南方週末》新年獻詞的話語變遷與集體記憶研究〉。《新聞界》，第9期，頁17-28。
- Zhang Zhen, Tu Shengbin, Chen Xiyuan, Song Leichen, Neng Qingqing, Fan Wei (2016). (1997-2016) Lixiang de “waiyi”: *Nanfang zhoumo* xinnian xianci de huayu bianqian yu jiti jiyi yanjiu. *Xinwen jie*, 9, 17-28.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張媛、文霄(2018)。〈微信中的民族意識呈現與認同構建：基於一個彝族微信群的考察〉。《國際新聞界》，第6期，頁122-137。

Zhang Yuan, Wen Xiao (2018). Weixin zhong de minzu yishi chengxian yu rentong goujian: Jiyu yige Yizu weixin qun de kaocha. *Guoji xinwen jie*, 6, 122-137.

張勇(2019)。《多維視野中的三線建設親歷者》。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

Zhang Yong (2019). *Duowei shiye zhong de sanxian jianshe qinlizhe*. Shanghai: Shanghai daxue chubanshe.

閻岩、張皖疆(2020)。〈數位化記憶的雙重書寫——百度貼吧中「克拉瑪依大火」的記憶結構之變遷〉。《新聞與傳播研究》，第5期，頁73-93。

Yan Yan, Zhang Wanjiang (2020). Shuweihua jiyi de shuangchong shuxie—Baidu Tieba zhong “Kelamayi dahuo” de jiyi jiegou zhi bianqian.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5, 73-93.

常江瀟、周曉虹(2021)。〈新中國工人階級勞動傳統的形成——以洛陽礦山機器廠為例〉。《社會學研究》，第4期，頁44-68。

Chang Jiangxiao, Zhou Xiaohong (2021). Xin Zhongguo gongren jieji laodong chuantong de xingcheng—Yi Luoyang Kuangshanjiqichang weili. *Shehuixue yanjiu*, 4, 44-68.

黃順銘、李紅濤(2015)。〈線上集體記憶的協作性書寫——中文維基百科「南京大屠殺」條目(2004-2014)的個案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期，頁5-23。

Huang Shunming, Li Hongtao (2015). Xianshang jiti jiyi de xiezuo xing shuxie—Zhongwen Weiji baike “Nanjing datusha” tiaomu (2004-2014) de gean yanjiu.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1, 5-23.

揚·阿斯曼(2015)。《文化記憶》(金壽福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 Assmann, J. [1992].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unich: C. H. Beck Verlag.)

Yang Asiman (2015). *Wenhua jiyi* (Jin Shoufu et al., Tran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Assmann, J. [1992].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unich: C. H. Beck Verlag.)

喻國明、馬慧(2016)。〈互聯網時代的新權力範式：「關係賦權」——「連接一切」場景下的社會關係的重組與權力格局的變遷〉。《國際新聞界》，第10期，頁6-27。

- Yu Guoming, Ma Hui (2016). Hulianwang shidai de xin quanli fanshi: “Guanxi fuquan”—“Lianjie yiqie” changjing xia de shehui guanxi de chongzu yu quanli geju de bianqian. *Guoji xinwen jie*, 10, 6–27.
- 楊俊蕾 (2006)。〈影像記憶中的歷史和個體：論《青紅》的現實品格〉。《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頁101–105。
- Yang junlei (2006). Yingxiang jiyi zhong de lishi he geti: Lun *Qinghong* de xianshi pingge. *Hangzhou shifan xueyuan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1, 101–105.
- 楊慧瓊 (2012)。《新時期的漂泊敘事和現代性體驗：對空間、時間和性別的家園體驗》。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Yang Huiqiong (2012). *Xinshiqi de piaobo xushi he xiandai xing tian: Dui kongjian, shijian he xingbie de jiayuan tian*. Xian: Shan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楊星星、唐優悠、孫信茹 (2020)。〈嵌入鄉土的「微信社區」——基於一個白族村落的研究〉。《新聞大學》，第8期，頁1–15。
- Yang Xingxing, Tang Youyou, Sun Xinru (2020). Qianru xiangtu de “weixin shequ”—Jiyu yige Baizu cunluo de yanjiu. *Xinwen daxue*, 8, 1–15.
- 愛德華·雷爾夫 (2021)。《地方與無地方》(劉蘇、相欣奕譯)。北京：商務出版社。(原書Relph, E.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 Paul.)
- Aidehua Leierfu (2021). *Difang yu wu difang* (Liu Su, Xiang Xinyi, Trans.). Beijing: Shangwu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Relph, E.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 Paul.)
- 趙靜蓉 (2013)。〈文化記憶與符號敘事——從符號學的視角看記憶的真實性〉。《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頁85–90。
- Zhao Jingrong (2013). Wenhua jiyi yu fuhao xushi—Cong fuhaoxue de shijiao kan jiyi de zhenshixing. *Jinan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5, 85–90.
- 劉靜伊 (2019)。〈三線建設博物館的集體記憶呈現探究——以攀枝花三線建設博物館為例〉。《視聽》，第4期，頁233–234。
- Liu Jingyi (2019). Sanxian jianshe bowuguan de jiti jiyi chengxian tanjiu—Yi Panzhihua Sanxianjianshe Bowuguan weili. *Shiting*, 4, 233–234.
- 劉亞秋 (2020)。〈技術發展與社會倫理：互聯網對文化記憶的建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第8期，頁74–82。
- Liu Yaqiu (2020). Jishu fazhan yu shehui lunli: Hulianwang dui wenhua jiyi de jiangou. *Fujian luntan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8, 74–8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1期(2022)

- 劉亞秋 (2021a)。《口述、記憶與主體性》。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Liu Yaqiu (2021a). *Koushu, jiyi yu zhutixing*.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劉亞秋 (2021b)。《被束縛的過去：記憶倫理中的個人與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
- Liu Yaqiu (2021b). *Bei shufu de guoqu: Jiyi lunli zhong de geren yu shehu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謝景慧、吳曉萍 (2020)。〈從集體身份到集體記憶：「三線建設者」的時空流變研究〉。《學習與探索》，第7期，頁26–32。
- Xie Jinghui, Wu Xiaoping (2020). Cong jiti shenfen dao jiti jiyi: “Sanxian jianshe zhe” de shikong liubian yanjiu. *Xuexi yu tansuo*, 7, 26–32.
- 羅晶 (2020)。〈「816」星光文旅小鎮——尋找時代記憶場所，弘揚三線精神文化〉。《美與時代(城市版)》，第2期，頁109–110。
- Luo Jing (2020). “816” xingguang wenlü xiaozhen—Xunzhao shidai jiyi changsuo, hongyang sanxian jingshen wenhua. *Mei yu shidai (chengshi ban)*, 2, 109–110.

####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Barbecho, L. B., & Toscano, M. (2016). The Spanish Republican Exile: Identity, belonging and memory in the digital world. In K. Borowiecki, N. Forbes, & A. Fresa (Eds), *Cultural heritage in a changing world* (pp. 237–253). Cham: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29544-2\\_14](https://doi.org/10.1007/978-3-319-29544-2_14)
- Birkner, T., & Donk, A. (2020). Collective memory and social media: Fostering a new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digital age? *Memory Studies*, 13(4), 367–383.
- Burkey, B. (2019). Total recall: How cultural heritage communities use digital initiatives and platforms for collective remembering. *Journal of Creative Communications*, 14(3), 235–253.
- Dunaway, J. M. (1985). Estrangement and the need for roots: Prophetic visions of the human condition in Albert Camus and Simone Weil. *Religion & Literature*, 17(2), 35–42.
- Fuchs, C. (2017). Fascism 2.0: Twitter users’ social media memories of Hitler on his 127<sup>th</sup> birthday. *Fascism*, 6(2), 228–263.
- Harju, A. (2015). Socially shared mourning: Constr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New Review of Hypermedia and Multimedia*, 21(1–2), 123–145.
- Harp, D., Grimm, J., & Loke, J. (2018). Rape, storytelling and social media: How Twitter interrupted the news media’s ability to construct collective memory.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8(6), 979–995.



- Khlevnyuk, D. (2019). Narrowcasting collective memory online: “Liking” Stalin in Russian social medi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1(3), 317–331.
- Pogačar, M. (2015). Music and memory: Yugoslav rock in social media. *Southeastern Europe*, 39(2), 215–236.
- Weedon, C., & Jordan, G. (2012). Collective memory: Theory and politics. *Social Semiotics*, 22(2), 143–153.
- Zhang, X., Nekmat, E., & Chen, A. (2020). Crisis collective memory making on social media: A case study of three Chinese crises on Weibo.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46(4), 1–9.

## 本文引用格式

- 辛文娟、張娜(2022)。〈重回共同體：社交媒體時代三線單位集體記憶的個人書寫——以STJ微信公眾號為例〉。《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1期，頁59–91。